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上海的读报组及其政治功效

杨丽萍

内容提要 成为执政党后,中国共产党需要快速实现政治社会化以实现政治整合。上海接管后,一种特殊的基层群众组织获得广泛发展,这就是读报组。这一组织不仅能够快速有效地将新政府的理念、政策、方针直接地传递给民众,塑造社会成员全新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人格,更重要的是借助其有组织的集体学习以及反馈机制,新政府实现了对政治社会化目标、内容、过程和效果的全面介入与控制,从而确保了政治社会化的实效性,达成了对市民的政治整合。

关键词 上海读报组织 政治社会化 政治整合 思想政治教育

杨丽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00062

DOI:10.13858/j.cnki.cn32-1312/c.2018.01.031

培育社会成员的政治观念、意识和立场,以形成可供整合、控制和汲取的政治资源,这是政治社会化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这一工作。成为执政党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从根本上强化对广大基层民众的政治教育,树立新政权的革命权威。对于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1]“革命成功后,中共业已成形的政治社会化方式多种多样,对中共而言,如何简单易行、快速有效才是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读报组充当了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担负起政治社会化的功能,从而得以广泛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统的政治教育渠道对政治社会化的贡献极为有限。早在解放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之时,以知识分子政治教育与思想改造为代表的政治教育政策就被明确提出^[2]。1949年初北平解放,全国开展了大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然而,相比为数有限的知识精英,工农民众才是更广泛的存在,对其进行政治教育,完成政治社会化更加重要。然而,对于业已完成或者无法集中学

[1]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225-226页。

习的社会大众而言,单纯依赖政府宣传或大众媒体的政治传播是无法确保政治社会化效果的,广泛发展读报组正是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

早在革命年代,读报组就得以创建和发展。1944年11月,李维汉在《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中提到,陕甘宁边区适应于群众文教运动的发展出现了大量“模范黑板报、读报组、工农通讯员、模范秧歌队”^[1]。同样,1945年6月,董必武在《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一文中,也提到为大力发展教育,需“普遍发展黑板报、壁报、组织读报组,实行小先生制等等,使每个人都有学习的机会”^[2]。《人民日报》在1946年5月16日创刊后第二天,就刊登了读报组的消息。平绥铁路“各段站间,均已成立工人读报组和业务剧社”^[3]。发展情况较好的太岳地区,“全区有读报组2100个”^[4]。

新中国成立后,读报组在上海的组织是伴随着全国范围内政治教育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上海被接管后,市委宣传部门、军管会的文教机关立即引导全市教师等知识分子展开政治学习活动。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政治与思想教育的方针、内容与方法被详细规定。与此同时,全国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政治学习、思想改造运动先后开展。一般而言,知识分子或者工人政治学习的组织形式有三:一是参加革命大学或短期培训班;二是参加行政机关举办的假期研究会、报告会等;三是参加本单位的学习小组^[5]。然而,教育体量超大且不具备集体学习条件的广大民众无法通过上述渠道实现政治教育,而读报组则解决了这一问题,其作为政治教育的载体优势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读报组突破了一般教育机构、设施和载体对学习对象的限制。

成为执政党后,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政治教育开展政治社会化以实现政治整合,而传统政治教育渠道却无法应对新政府所面临的困境:一是教育对象是广大民众,教育体量极大;二是上海民众要么业已经过资本主义政治教化,要么受制于年龄或其他客观条件难以实施政治教育。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上海是拥有500万人口之众的超大型城市,即使剔除了知识分子和工人等单位人,难以进行有组织政治教育的非单位人口也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6]。如此体量庞大的政治教育对象是无法通过传统机构和组织进行教育的,而读报组却能够通过组织化平台化整为零地实现对全民众的集中教育。就第二个问题而言,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浸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长达百年的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效斐然,因而其制度认同度亦较高,物质的、非物质的资本主义文化也未随着国民政府的瓦解而消散。相应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影响力却极为有限,普通大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大多建立在广为流传的谣言基础上,诸如“共产共妻”之说。

与此同时,尽管现代媒体在当时已经有了不小的发展,但无论书报或有声传媒覆盖率依然低下,纸质传媒对于文盲和半文盲为主体的社会大众教化意义不大。根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妇女文盲的人数,约占妇女人口的70%以上,以经济情况较好的新城区来说,全区共有妇女66000多人,而文盲就占到28000多人。而贫苦劳动者集中的杨树浦区,情况就更加严重,全区25000多个妇女中,文盲人数就有20000多,其他如普陀区、闸北区、徐汇区的情况也是类似,妇女文盲人数占到百分之八九十^[7]。男

[1]《李维汉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页。

[2]《董必武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3]《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后淄博矿区煤产倍增,平绥铁路工人反奸后工作积极》,《人民日报》1946年5月16日,第2版。

[4]《太岳群众翻身,大众文化广泛发展,鲁中区成立民粹九千作处》,《人民日报》1946年5月20日,第2版。

[5]于风政:《建国后政治运动的源头——政治学习运动述评》,《北京党史》1999年第4期。

[6]参见拙著:《从非单位到单位——上海非单位人群组织化研究(1949-1962)》,〔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7]培英:《发展中的家庭妇女识字班》,〔上海〕《新民晚报》1951年12月17日,第3版。

性固然读书识字的比例高于女性,但在普通民众中文盲仍然不在少数。而读报组织及其活动则能够弥补传统渠道的不足,使得新政府的政治教育有可能向人民大众中深入进行。

第二,作为政治教育的媒介,读报组及其活动突破了传统媒介单向度输出的局限。面向民众的政治信息传送渠道,诸如政治宣传和媒体放送通常是单向度的信息输送,教育的实效性难以确保。事实上,一些读者“将报纸当做茶余酒后的消遣品,专门找刺激性的社会新闻。对自杀、抢劫等小事情,看起来津津有味;对国家建设、政治问题、工作问题、世界形势等大事,却感到无关重要。”^[1]毕竟,对于普通智识的民众而言,政治概念、知识和资讯通常都是枯燥而乏味的。

然而,作为意识形态迥然不同于旧政权,且刚刚获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政治教育的效果关系到其政治功能的发挥。因此,整个政治教育开展过程中,政府都希望实现对教育目标、过程和结果的介入和控制,读报组则契合了此种需要,正如新闻总署在《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的:“读报组应该是报纸内容经常的和有组织的学习者和宣传者,读报组同时应当向报纸报告地方情况和群众意见”^[2]。事实上,读报组织及其活动一方面加强了与群众的联系。在《文汇报》的读报组织公告中,明确指出,读报组是“为加强报纸和群众的联系,便利读者有组织地学习和宣传报纸内容,以进一步将学习和爱国运动结合起来”^[3]。另一方面,读报也“加强了对政府的联系。报纸好像是一个桥梁,你对政府工作,地方生活有意见吗?可以批评错误和缺点,这样,人民政府将会更好的替你们办事情,报纸将更好的为你们服务。”^[4]

由此可见,借助读报及其组织活动,政府和民众有可能实现双向互动。在此过程中,政府有望实现对政治教育内容有计划、有组织的定向输出。更重要的是,受众的学习过程被政府介入,反馈亦有固定的渠道,从而能够实现对教育效果的控制。

第三,读报组特别是其有组织的读报活动,使得群众性的政治教育也能实现有组织的集体学习。

集体学习是低成本、高效率组织化学习的组织模式。然而,对教育机构、单位,乃至讨论会、报告会等集中培训而言,政治学习所能覆盖的对象总是有限的。与此同时,在上海这类中国共产党根基薄弱的新解放区,执政党更希冀通过对全体民众进行政治教育来实现政权的巩固。

读报组作为基层群众组织,几乎不耗费公共资源,就能实现对广大民众的集中教育,这是新政府大力推广的原因之一。读报组通常是在政府主导下建立的群众性组织,简单易行,却极为实用。读报组所搭建的集体学习平台,使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有可能实现。“一个人看报往往受自己的水平限制,会碰到许多看不懂的问题,对有些重要的文件,也不能做透彻的理解。所以须要发挥集体互助作用,组织读报组,大家在一起读报,对重要问题很好讨论,互相帮助,见识就扩大……并且可以互相督促推动学习。也扩大了报纸宣传效果,使每一读者不但能深刻的了解报纸的内容,更会将报纸上的号召和鼓勵,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和物质力量”^[5]。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不遗余力地推广读报组,关键在于“组织读报组这个工作不是临时任务,而是长期深入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它从来都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6],担负着对广大民众进行政治教育,进而实现政治社会化以及政治整合的重要历史使命。

[1]钟力然:《读报观点与时事学习》,〔上海〕《文汇报》1951年3月5日,第5版(附刊第1版)。

[2]桂贵:《搞好读报组的几点意见》,〔上海〕《文汇报》1950年7月29日,第5版(附刊第1版)。

[3]《文汇报读报组组织办法》,〔上海〕《文汇报》1951年4月3日,第5版(附刊第1版)。

[4]《组织读报组的好处》,〔上海〕《新民晚报》1951年2月16日,第3版。

[5]祖远:《为啥组织读报组》,〔上海〕《文汇报》1951年4月13日,第5版(附刊第1版)。

[6]何俊瑞:《怎样搞好读报组》,〔上海〕《文汇报》1951年4月14日,第5版(附刊第1版)。

二

既然读报组是民众进行政治教育的载体,那么如何保证其受众的广泛性?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非官方的、非系统性的政治教育,如何保证教育目标、内容的一致性,中国共产党最为关注的政治社会化实效性又如何得以实现?事实上,读报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政治教育媒介并实现其政治效能,这是一系列组织安排和调适的结果。

1. 读报组织及其网络的设立 读报组织及其网络的设立确保了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市民大众。上海接管后,适应于基层社会的组织化,大量的基层群众组织建立起来,读报组便是其一。从1950年开始,各区企事业单位乃至里弄居民都参与到此活动中来。特别是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社会群体中,读报组的发展更为突出。据1951年9月的统计,“全市已组成读报组1252个,参加读报的工人达24647人。”^[1]截至1952年6月底,普陀区组织了215个读报组,参加读报的共计3360人^[2]。那些远离政治生活的普通民众甚至家庭妇女也被吸纳到读报组中。嵩山区“全区已有598个读报组,参加读报组的人数有13000多人。许多居民自愿腾出客堂、房间,甚至腾出店堂作为大家读报的地方。在读报组中,很多是家庭妇女,学习情绪很高。”^[3]

不同于针对性较高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政治教育工作,读报组并非只针对文盲或阅读困难者,作为政治教育的平台,它也将知识精英囊括在内,例如教师。“教师是有一定的文化水准的,对于看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所以就不愿意集体读报或讲报。基于这两种情况,我们先讨论读报的重要性,纠正思想上的不正确观点,说明集体学习的好处”^[4]。因此,适应于政治教育的全民化,读报组大量创建起来,并渐次实现了读报网络的构建。

当然,作为全民政治教育的渠道,起初读报组枯燥难懂的政治化信息输出难免遭遇冷场。一些民众对纷至沓来的各种基层组织及其活动本身就颇有微词,更何况是读报组。“共产党来后名堂可多啦!这会那会不算,最近又搞什么读报小组,这是什么道理?”^[5]群众如此,干部的觉悟也参差不齐。到1952年时,仍有干部不甚重视读报,以至于迫使新政府进行了机关干部读报情况的检查工作。“在机关干部中普遍进行了一次读报检查是适时且必要的,……克服不问政治不经常阅读报纸的倾向”^[6]。

对干部读报可以厉行检查,对群众忽视读报的问题,则只能进行说服,诸如明确读报的意义,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要明确这一点,今天组织读报组绝对不是为了单纯的学习,为了装门面或好奇而组织,而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使我们更有系统的去讨论,去解决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各方面所遇到的困难问题,去更明确我们今后的伟大任务是什么?今后的目标是什么?”^[7]经过不懈地宣传、引导,特别是当读报这种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成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评判标准之后,群众参与各种组织的热诚空前高涨起来,这为读报组注入了强心剂。“时事学习的热潮,已普及全国各地;大家一致认识到,这种学习,已不再是临时的或突击性的任务,而是长期的一种自我教育的重要手段”^[8]。

[1]《搬运工人组织的读报组》,〔上海〕《解放日报》1951年11月10日,第5版。

[2]《各区里弄居民庆祝党的生日,普陀区组织两百多读报组作为献礼》,〔上海〕《新民晚报》1952年6月30日,第4版。

[3]吴根林:《嵩山区已有近六百个读报组》,〔上海〕《新民晚报》1952年5月21日,第4版。

[4]胡尔:《通过读报,搞好团结关系,推动各项工作》,〔上海〕《文汇报》1952年3月13日,第5版(附页第1版)。

[5]余意心:《怎样搞读报小组》,〔上海〕《文汇报》1950年3月20日,第3版。

[6]《关于检查机关干部读报情况的通知》,1952年,上海市档案馆A71-2-896。

[7]胡瑞荣:《组织读报组的一些意见》,〔上海〕《文汇报》1951年4月18日,第5版(附刊第1版)。

[8]雪舒:《介绍一种机关和学校里适用的读报方式》,〔上海〕《文汇报》1951年9月11日,第6版(附页第2版)。

与此同时,读报组的广泛发展也不可能依靠单纯的宣传工作,组织力量的介入和扶持才是读报组持续广泛存在的核心因素。

一方面,各级基层群众组织大多参与到读报的组织活动中来,工会、居委会和妇联等组织纷纷凭借自身组织基础和优势开展读报的组织工作。吴淞区大中华造纸厂有工人474,职员39人,自1951年6月开展读报工作以来,按生产部门建立了35个读报小组,70个读报员,所有工人都参加了读报小组^[1]。“店员工会静安区文教工作委员会为了提高会员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本月初起即发动各组联会、独立基层建立读报小组,到十八日为止,全区读报小组已由20个组发展到302个组,参加人数已达2341人,占全区店员的三分之一,并在继续发展中。”^[2]

除了工会外,妇联的成绩也十分突出。截至1952年5月,“民主妇联蓬莱区办事处和各有关部门已组织了‘读报工作组’,并且已经组织了125个读报组。”^[3]其他各区均有发展,如表1。

另一方面,组织者还依托原有基层群众组织,赋予读报功能,从而形成了覆盖面极广的读报网络。早在读报组建立之前,上海基层社会已经建立大量具有学习性质的群众性组织。除了“生活小组”“学习小组”“工作小组”之外,还有大量其他文娱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均有条件开展读报活动。“我们选择冬防组织较有基础的里弄,如其昌栈大街一九三弄,陈家门等地进行典型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广至其他里弄。这些地区的居民经过不断的宣传教育,提高了认识,都迫切的要求加强爱国主义的时事学习。”^[4]冬防组织以及此后的居民委员会都是当时基层社会最为广泛且固定的群众性组织,在这些组织楔入读报功能,是读报组网络遍布全市的关键。

1952年为上海读报组发展的鼎盛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仅黄浦区到6月底就有3730组,36000余人参加^[5]。普陀区全区有读报组5000多个,参加者20多万人^[6]。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期间,配合全市性的宣传工作,读报组发展到23166个。下半年,全市又开展了私营工厂民主改革、爱国卫生运动、禁毒、劳动就业、庆祝建国三周年及“中苏友好月”等工作,围绕这些工作的宣传与鼓动,群众读报组织进一步发展,达到42473个,读报员11694人,参加活动人数达622447人^[7]。

读报组织的构建,特别是其与政府末梢组织的联网,使得全市性的、高覆盖率的读报网络最终形成。通过读报组织网络,即使是游离于常规政治教育渠道之外的社会成员也被纳入体制内的教育网

表1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1952年下半年度读报组统计

区名	组数	人数
卢湾	197	3016
邑庙	142	
普陀		4000
徐汇	92	1472
杨浦	78	1303
老闸	99	
江宁	78	1092
北站		
提篮桥		
长宁	13	202
静安	161	2123
常熟	242	3471
虹口	443	6834
北四川	138	2455
嵩山	38	2500
蓬莱	152	1779

资料来源:《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宣传教育部关于1952年下半年度读报组总结》,1952年,上海市档案馆C31-2-142-37。

[1]《吴淞区大中华造纸厂读报工作报告》,1952年,上海市档案馆A-71-2-896。

[2]王启超:《静安区店员读报组迅速发展》,〔上海〕《新民晚报》1952年3月20日,第4版。

[3]《蓬莱区妇女组织读报》,〔上海〕《新民晚报》1952年5月13日,第4版。

[4]《组织里弄读报组的初步经验》,〔上海〕《解放日报》1951年5月17日第6版。

[5]《黄浦区志》编纂委员会编:《黄浦区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890页。

[6]《普陀区志》编纂委员会编:《普陀区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794页。

[7]《中共上海党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99页。

络,从而实现了政治教育覆盖面的全民化。

2. 有组织读报活动的开展 政权初立阶段,新政府的政治教育目标,主要是完成政治社会化和整合,相应的读报组输出的政治教育内容形成为两大块。一是“提高思想水平”。一方面,通过读报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以及国内外形势传达给民众,以“提高群众的文化政治水平”^[1]。另一方面,通过消化各种政治理论,改造思想,培养阶级觉悟。二是“推动生产”^[2],使政治理论学习走向实践,通过对报纸上各种政治理论的内化以及联系实际。一方面凝结共识,明确阶级立场;另一方面通过典型示范或经验推广,塑造出社会主义公民的人格和道德品质。要完成这些教育目标,个体的、无组织的阅读以及单向度的放送是无法保证的,因此,在依赖读报的组织化平台与网络基础上,还必须展开有组织的读报活动,以确保特定的政治教育内容定期、定向、有组织地传输。

首先,设立读报员,或推定读报组的发言人。读报员原本就是组织选派,每次读报活动所交流和讨论的主题由此得以预先设定。“讲报员出发之前,大家碰碰头,先决定讲的题材,然后将要讲的先看一两遍,再决定讲的办法”^[3]。一些读报组即使没有固定的读报员,读报的内容也不是随机,“在读报方法上,我们不采取读报员制度,而是在每次读报会前推定中心发言人,由他来把最近的时事简单扼要的加以分析作小报告一刻钟到廿分钟,然后由他提出问题及根据大家所提出的问题,展开漫谈讨论,并尽可能的连系(联系)实际,连系(联系)生产。”^[4]

其次,定期公布读报组讨论提纲和参考资料,防止讨论主题分散。读报组织如此广泛,读报员或是中心发言人的能力自是参差不齐,为了避免读报组“跑偏”既定的政治主题,读报的中心议题会通常在事前借助报纸或黑板报进行预告。《文汇报》就专门在其栏目“社会大学”中,增设了读报讨论提纲以供读报组使用,而此前该栏目主要刊登“家长里短”的社会信息,“本组接受许多读报组的要求,从今天起,每星期一、三、五在社会大学公布读报组讨论提纲,希望各组按照提纲讨论,也希望尚未组织读报组的读者组织讨论。”^[5]例如,1951年5月28日《文汇报》刊登的“读报提纲”,其内容第一条为:“以五月廿二日本报一版人民日报社论:‘放手发动群众控诉与检举反革命分子’及廿七日本报二版解放日报社论:‘进一步深入与展开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为中心内容,希望各读报组及非读报组读者组织学习这两篇论文。”^[6]大多数“读报提纲”选取当期政治时事和政府中心任务,而为了强化群众对中心任务的认知,关于政治中心任务的提纲会多次出现。不仅如此,每期的“读报提纲”中都列了“参考文献”,规定了读报组的参阅范围。以下是一份读报提纲:

读报组讨论提纲

- (一)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实际行动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
- (二)为什么说三反、五反的斗争和朝鲜战场上的斗争具有同等的意义?
- (三)从不法资本家王康年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一案怎样认识资产阶级的狰狞面目和恶毒心肠?
- (四)志愿军代表到各地进行宣传,为什么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一支新的力量?

[1]王建平《我们是怎样搞读报组的》,〔上海〕《文汇报》1951年4月16日,第5版(附刊第1版)。

[2]铁军:《我们怎样搞好读报工作的?(下)》,〔上海〕《文汇报》1951年7月13日,第5版(附刊第1版);胡尔:《通过读报,搞好团结关系,推动各项工作》,〔上海〕《文汇报》1952年3月13日,第5版(附页第1版)。

[3]《不识字的人也可以读报》,〔上海〕《新民晚报》1952年5月23日,第4版。

[4]陈胜冬:《文化程度高的人不必组织读报组吗?》,〔上海〕《解放日报》1951年11月14日第5版。

[5]《读报提纲》,〔上海〕《文汇报》1951年5月14日,第5版(附刊第1版)。

[6]《读报提纲》,〔上海〕《文汇报》1951年5月28日,第9版(附刊第1版)。

参考材料:

- (一)志愿军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到上海的新闻(今天一版)
- (二)人民日报社论“欢迎祖国的英雄子弟和朝鲜的英雄友人”(一月廿日一版)
- (三)控诉奸商王康年的万恶罪行(八日二版)

资料来源:《读报组讨论提纲》,《文汇报》1952年2月11日,第5版(附刊第1版)。

如上,这份提纲几乎将该时段重要的政治大事件尽数囊括,包括志愿军回国,“三反”“五反”,增产节约运动等。除了报纸和黑板报,广播也会对读报提纲进行预报。“广播台配合读报,每天把读报时所要读的新闻,先行广播,在读报以前五分钟,广播台就报告今天读报提纲以及讨论的题目,这样使每一个读报组都有了统一的领导,在讨论的时候也有了提纲。”^[1]为了防止主题被人为分散,组织者一再警告读报员,“担任读报的人,不可犯兴趣主义的错误,自己高兴读便读,自己不高兴读的便不理。假如是工人读自己工会的报纸,应当先读‘通告’‘通知’或工会的其他号召,再读时事文艺等。”^[2]

读报辅助学习材料也会定期集结出版。例如,1951年4月10日出版的《坚决镇压反革命》,其广告中明确说明:“为了保障人民革命胜利的果实,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了建设人民的国防、发展人民的经济、文教事业创设必要的条件,并集中人民意志和进行正义措施,都必须坚决执行惩治反革命条例。本书提供学习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完整资料,是每一个中国人民所必备的读物。”^[3]同年6月21日,出版了学习资料《武训与“武训传”的批判》。

原本通过指定和设立读报员就能够保证读报内容围绕固定的政治内容,而后通过下达讨论内容,以及推出参考资料等方式,则进一步确保了既定的政治教育主题和内容沿着组织者预设的方式输出。

3. 读报反馈机制的创设 读报组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教育组织和媒体,关键还在于读报活动包含了教育效果反馈这一关键性环节,这使得整个教育过程和结果实现了组织控制。读报信息反馈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开展:其一,组员讨论;其二,读者来信;其三,汇报制度。

读报现场进行的讨论是重要的信息反馈活动。读报组在组织过程中,明确要求必须具备讨论环节,而非一味地读报,如此避免了生僻的政治概念、理论读不懂、理解不了的问题。至于如何讨论,各个读报组采取的策略不同:有的组“每一周内将重要的时事问题或当地的重要工作提出讨论,让读报组每个同志都能得到正确的认识,然后便可有系统的向群众宣传。”^[4]也有的紧踩时事要闻,“根据今天报纸上的重点提出若干问题,其中一部分所指定某同学在明天读报时间答覆,一部分则作为每天时事讨论的题目,由各小组于当日读报完毕后开会讨论之。”^[5]无论如何选择,读报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业余休闲活动。“新社会的报纸,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是主要的教育工具之一。因此,报纸不仅要好好的看,而且要集体的讨论研究,从读报中学习政策,学习业务,交流经验,提高水平。”^[6]

读者来信是另一种信息反馈方式。沪上三大报纸《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都分别成立了各自的读报组,并开辟专门的版面来刊登读报组来信,回复读报组的疑问。例如,《文汇报》就设立了“读报问答”等栏目。“凡读报组来信,应在信封上写明‘读报组通信’,可不贴邮票,由本报统一付费”。甚至为了激发读报组的积极性,在《文汇报读报组组织办法》中写明:“凡读报组来信,一经刊用,一律

[1]金治:《广播推动了读报》,〔上海〕《新民晚报》1952年8月2日,第3版。

[2]余意心:《怎样搞读报小组》,〔上海〕《文汇报》1950年3月20日,第3版。

[3]《文汇报读报组学习资料》,〔上海〕《文汇报》1951年4月9日,第3版。

[4]桂贵:《搞好读报组的几点意见》,〔上海〕《文汇报》1950年7月29日,第5版(附页第1版)。

[5]蔡志俭:《介绍一种读报方法》,〔上海〕《文汇报》1951年5月7日,第5版(附刊第1版)。

[6]《重视读报》,〔上海〕《文汇报》1952年6月24日,第5版(附页第1版)。

发给稿费,如反映群众情况与提供意见而有重要价值者,不论发表与否,均给予相当稿酬。”^[1]

相比较前两种,设立读报组汇报制度,则保证了教育效果反馈的制度化。各个读报组在设立和运作的过程中即明确要求贯彻汇报制度,例如《文汇报》组织的读报组在《文汇报读报组组织办法》中就明确规定读报组须发挥汇报职能。“本报读报组应负担下列各项工作”,包括“(二)随时汇集读报小组内及周围群众在各种工作与学习中的思求,迅速向报社反映”,“(三)每半月向本报报告读报情况和对本报的批评与建议,并反映周围群众对本报的意见”,“(五)读报组小组长应参加本报定期召开的读报组联席会议,无故不得缺席。”^[2]除了组织章程中予以明确,一些读报组甚至另设架构来承担汇报职能。例如,虹口区里弄宣传队(由区政府文教科、派出所、区妇联、抗美援朝支会等联合组成)设立了读报辅导组,该辅导组的内部有具体分工,其中,正副组长的职责是负责掌握会议汇报制度,统一布置和检查工作,并定期向区政府文教科报告。通讯员负责向报社经常汇报群众思想情况,反映群众意见,介绍读报工作经验。这种辅导组还得到推广^[3]。

4. 政治教育效果的提升 正如大多数制度设计在遭遇现实生活之后,其实际作用总是难以预测一样。在以读报组为媒介的政治教育过程中,一边是生僻的政治概念、理念和陌生的新政权,另一边是文化水平较低,且对于政治、时事漠然的群众。两者先天的疏离和现实中的隔阂不是轻易能够化解的。各种渠道的反馈显示,读报组在开展期间确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读报组作为政治教育的载体其使命是忠实地输出教育内容,而一般民众对艰涩的政治教育广泛存在排斥心理也是不争的事实。“过去从事里弄宣传的缺点,便是专用一番空洞的理论,使一般居民,特别是文化水准较低的老太太和一部分家庭主妇不容易听懂,又因她们在过去旧社会中向来不大留心‘天下事’,一旦接受了这么许多的宣传,便难以消化。”^[4]“除了政治内容本身枯燥乏味之外,缺乏技巧的读报也难辞其咎。“读报员读得好不好,对于读报组的影响极大。过去我们读报是轮流,但因大家都无经验,所以读报员读的时候,死照报上的字句一一念下,枯燥无味,一点也引不起大家的兴趣,倒大大影响了读报情绪。”^[5]“普遍发生了不知道应该怎样巩固的问题,原因很多,根据调查,一般是由于材料选择不适当;读报员的方式方法不好;或者就是讨论时发言的人不多等等。”^[6]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到了教育的效果,甚至危及读报组织的存续。“‘听勿大懂,长得要命,听到后头,前头早忘掉了,唔啥意思。’‘读报的叽叽喳喳只管往下读,有许多地方不晓得讲点啥。’因此不少工友放工后藉口有事,拿起饭盒回家了,人数一天比一天少,读报员读得吃力煞,群众还是一个一个的溜”^[7]。

既然读报组所担负的是政治教育功能,政治社会化的实效性便是组织者最为关心的问题。针对反馈渠道反映出来的各种问题,新政府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

首先,从内容上,在保证政治教育内容为主的前提下,附加一些实用的社会生活信息,确保后者服务于前者。民众排斥政治教育的原因是其缺乏实用性,而读报组需要做的是设法打破群众的误解,令群众感受到政治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做一个好的读报员,一定要了解听众的生活、思想和文化程度;选的材料,要适合他们的要求。这样,读报组才能巩固和发展。”因此,在“选择材料的时候,总是找和听众生活接近的问题来讲,然后一步一步的引到国家大事上去。”^[8]

[1][2]《文汇报读报组组织办法》,〔上海〕《文汇报》1951年4月3日,第5版(附刊第1版)。

[3][6]《虹口区的读报辅导组》,〔上海〕《新民晚报》1952年7月4日,第4版。

[4]俞华:《读报和讲报》,〔上海〕《新民晚报》1951年8月8日,第3版。

[5]李永耀:《建立读报组应注意的几点》,〔上海〕《文汇报》1951年9月19日,第6版(附刊第2版)。

[7]铁军:《我们怎样搞好读报工作的?(上)》,〔上海〕《文汇报》1951年7月12日,第5版(附刊第1版)。

[8]《永嘉路十九弄读报组的好经验》,〔上海〕《新民晚报》1952年5月19日,第1版。

其次,在形式上,采用故事性的叙述方式讲解政治内容,消解政治信息的枯燥乏味。由于政治知识或信息对于文化层次低且远离政治生活的人群难免有枯燥而无用之感,如不能对其进行筛选和加工,则很难引起受众的兴趣。因此,读报材料的选择上要注重迎合受众喜好。“选择故事性较强的消息(如姚大娘捉特务,里弄妇女检举反革命分子)等,用通俗语气讲给大家听,以后,再联系到抗美援朝,又讲些朝鲜前线的胜利及政府号召等消息,总之,尽量适合群众所能接受的程度,而加以叙述,而不是一般性的生硬朗诵。”^[1]

最后,针对轻视读报的情况,采取检查制度,并对发现的问题予以纠治。1952年年中,上海市市委下达了《关于检查机关干部读报情况的通知》,检查内容包括:各单位订有各种报纸及主要时事政治刊物的名称和份数(包括平均几个人一份报纸和刊物);各单位有阅读能力的干部与无阅读能力的干部各占多少;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机关支部平时对本单位党内外干部时事学习的领导情况等。而应对措施包括:按月由机关内党的报告员作一次综合性的时事报告或专题性的政策报告;每月举行时事测验一次,并公布答案与成绩;组织时事座谈会等^[2]。

各种措施齐头并进使得政治教育方法、手段不断完善。特别是社会性资讯的加入,提高了教育内容的丰富性,而多样化教育方法和手段引入,提升了政治教育的趣味性,这些共同促成了政治教育的大众化,提高了政治教育对社会生活的融入度。

三

正是以读报组及其活动为载体,全新的市民政治教育模式建立起来。通过各种组织安排与协调,读报一改单向信息输出的最初功能,转而成为目标明确、内容固定、过程可控、效果确保的政治教育载体。依赖读报组及其活动,新政府实现了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整合,在获得政治认同的同时,也获得了充沛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来推动国家治理和建设。

表现一,借助读报组及其活动所开展的政治教育,使上海民众具备了新的政治立场和人格,完成了政治社会化,为新政府获得政治认同奠定了思想基础。广泛而深入的读报组织及其网络以及组织化的运作模式,首先确保了政治教育中的各种政治信息输出始终在组织者的管理和控制之下。通过这一平台,新政府将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制度等基本政治社会化的知识、理念以及各种时事资讯传输给民众,而上海市民则通过有组织的读报活动,对新国家、新政权有了基本的认识。通过读报,民众得以“通晓道理。报上登的文章里,有很多新社会的新道理。懂了这些道理,就会用新眼光看新事情,用新态度做新事情,读了报懂得政府的政策法令,就能够依理行事。”^[3]不仅如此,读报组的政治教育效能还体现在对民众阶级觉悟、阶级立场的培育方面。“通过读报使工友群众提高了思想水平,澄清了许多模糊观点。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刚开始时,许多工友存在太平观念,警惕性不高,当每天听到看到报上许多特务罪恶破坏的消息,教育了大家,在上下班时检查机器就用心了,并且还联系自己在反动派统治时所受的痛苦和压迫进行控诉,更增加了对特务的仇恨和对祖国的热爱,并协助肃清反革命委员会获得不少反革命份子的材料。”^[4]正是因为民众具备了这样的政治觉悟和立场,新中国成立之后所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才获得了充沛的精神支持。“我们第一〇〇〇六读报组在今天配合了冬防服务队在江湾镇组织五十多处收听广播站,有三千多人收听,大家在收听控诉恶霸罪行的时候,齐

[1]程玮:《妇女读报组》,〔上海〕《文汇报》1951年6月8日,第7版(附刊第3版)。

[2]《关于检查机关干部读报情况的通知》,1952年,上海市档案馆A71-2-896。

[3]《组织读报组的好处》,〔上海〕《新民晚报》1951年2月16日,第3版。

[4]铁军:《我们怎样搞好读报工作的?(下)》,〔上海〕《文汇报》1951年7月13日,第5版(附刊第1版)。

声大喊:‘杀掉它!’‘杀掉这些恶霸!’通过这次收听广播,大家对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有了更进一步的仇恨,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检举、镇压反革命分子。”^[1]

表现二,借助以读报组及其活动为载体的政治教育,新政府得以整合和协调社会资源与行动,形成强大的执政资源。政治教育的另一个政治功效是整合社会资源、行动以投入新政府的各项政治、经济建设。读报组所承担的政治教育破除了传统政治社会化对受众的种种限制,实现了教育对象的广泛性。读报组及其活动的广泛、深入是空前的,不仅是机关、企事业单位,连里弄空间也无不覆盖。特别是由于读报组破除了阅读障碍,社会动员的范围大为拓展,文盲甚至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也被调动起来。“新成区大中里的妇女读报小组,为了响应‘增产节约’的号召,在里弄里推动了两项工作:(一)储蓄小组——目的在协助政府积累资金,读报组组长带头发动全弄姊妹节省零用钱,储存有奖储蓄,……(二)节约方面——结合里弄爱国公约,发动每户每月节电一度运动。同时随时随地检查自来水龙头,避免漏水。并保证过节过年不铺张浪费。改革年节多买东西的风气。全里弄的居民,因为受了读报组组员的积极影响和组员们的深入宣传,都已获得很好成绩。”^[2]不仅如此,以读报组及其活动为载体的政治教育除了实现了对教育对象的全员化覆盖,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对如此体量庞大教育对象的教育过程和结果的可控,这些都使得政治社会化的整合效果最大化,实现了凝结共识,统一行动,投入国家建设的初衷。“法电自来水间工友读报读到了国营南京机器厂工友利用空暇时间清理仓库的新闻,工友们即展开了讨论,……经过工友们几天的积极努力,总共清理出大小螺丝627只,各种自来水弯头102只,自来水管各种接头238件,自来水管塞头666只,白铁管子56.95公尺,青铅165磅,麻丝35.8磅,其他另件(零件)185件。以上各项物件,总值人民币2500余万元。”^[3]正是政治教育强大的整合实效性,使得上海民众的思想面貌发生逆转性的变化。众所周知,解放前,城市生活的匿名性,使得向来以精明世故著称的上海人谨守“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生活智慧,读报组及其活动却打破了基层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冷漠,甚至社会化程度极低的家庭妇女也开始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通过了读报组,姊妹们均有了劳动及服务大众观点,里弄中从前任何一项工作,她们很少关心的,现在大家都参加了。居民会同志说:‘想不到读报读出来了许多积极分子’。例如这次卫生运动,姊妹们非但在自己家里做好卫生工作,而且把里弄大扫除已认为当然之事了,许多姊妹们参加卫生组,大大推动了里弄工作”^[4]。

综上所述,读报组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教育载体,不仅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化,快速塑造了全新的政治个体和政治人格。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组织读报讨论和创设教育反馈机制,实现了政治教育从目标到过程和效果的可控与协调,使得新政府能够依赖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政治效应快速有效地整合社会意志和行动服务于国家建设,助力新政府在短短几年间就获得了政治认同并实现了政权稳定和经济恢复。

[责任编辑:道成]

[1]《里弄读报组发动居民收听,控诉大会教育了广大群众》,〔上海〕《文汇报》1951年6月1日,第9版(附刊第1版)。

[2]《大中里妇女读报组推行储蓄节约工作》,〔上海〕《新民晚报》1951年12月30日,第4版。

[3]孙进福:《法电自来水间工友通过读报清理出大批物资》,〔上海〕《文汇报》1952年1月5日,第3版。

[4]鲍光伟:《读报组读出了许多积极分子》,〔上海〕《新民晚报》1952年10月28日,第2版。